

【历史研究】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陈艳 乔军

摘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汉代礼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权的无上权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

关键词:汉代;乐器;礼乐制度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5-0122-08

在中国礼乐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汉代绝非简单地照抄前代,而是因时、因宜创造性地改善和传承:既整理传承先秦之乐器及礼乐制度,以适应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形势,又在此基础上规范礼乐制度,使礼乐等级更加森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思想、审美以及时代的发展,东汉时期,礼乐的制度功能逐渐弱化,乐的表现更加世俗化,乐为人用,形成了后世礼乐文化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特征。关于汉代礼乐制度的研究,陈戌国先生在《中国礼制史·秦汉卷》一书中勾勒了两汉礼制的轮廓^①,冯建志所著《汉代音乐文化研究》则结合部分考古资料 and 传统文献^②,将两汉乐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此外不少学者均有论及,但是随着汉代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仍有深入分析的必要,本文将结合汉代乐器考古资料与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考证。

一、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的特征

目前已发掘汉代墓葬几万余座^③,墓葬等级包括帝陵、王侯、中小官吏以及平民,已出土乐器及相关音乐文物千余件^④,考察汉代墓葬出土的乐器,从

其时代、种类、出土位置等来看,各有特征。

1. 汉代出土乐器的特征

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乐器形制种类的差异,二是乐器组合的差异。

首先,乐器种类的差异主要是指西汉至东汉时期乐器种类不断增多,形制也有所变化。西汉时期墓葬出土的乐器既有礼制乐器,如铜编钟、编磬、编勾鑃,或陶(木)质的模型钟磬,也有丝竹管弦类乐器,如琴、瑟、箏、筑、排箫、笛,还有匏革类的如笙、竽、建鼓、小鼓、悬鼓等。西汉礼乐制度受周代礼乐制度的影响较大,代表等级、权力的礼乐器钟磬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高等级王侯墓葬出土的礼制乐器更为显著。如西汉早期洛庄汉墓14号乐器坑出土有铜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6套(107件)等^⑤,南越王墓出土有铜钮钟14件、铜甬钟5件、编磬18件及编勾鑃8件等^⑥,西汉中晚期的海昏侯墓则出土有铜钮钟14件、甬钟10件、铁编磬14件、铜铙4件^⑦。东汉时期墓葬出土乐器形制和种类则有所变化,礼制乐器数量减少,王侯以上高等级墓葬中很少

收稿日期:2021-02-23

作者简介:陈艳,女,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郑州 450000);韩国汉阳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南华大学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导师。

乔军,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州 450000)。

见到钟磬类乐器出土,已公布的材料中仅见河北北庄汉墓出土铜铎 1 件^⑧,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墓出土陶钮钟 3 件^⑨,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残存石磬 1 件和铜铃 3 件^⑩。中小型墓葬则出土了大量的乐舞画像和乐舞俑,其描绘的乐器以弹拨类和鼓吹类为主,弹拨类乐器如琴、瑟、箏、箜篌、琵琶等,鼓吹类乐器如建鼓、盘鼓、笙、竽、胡笳、箜篌、排箫、埙等,如河南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乐舞画像内容所见乐器有抚琴、鼓瑟、吹埙、吹箫、建鼓^⑪,河北安平逐家庄东汉壁画墓,墓室西壁为乐舞画像,所奏乐器有箫、琴、鼗、笛,另有舞伎表演踏鼓舞等。^⑫这一变化说明,东汉时期礼乐制度已经大为衰落,随葬品生活化、从俗性的特征显著,乐器种类亦呈现出模型化和生活化的特征^⑬。

其次,乐器组合的差异,主要表现是西汉墓葬出土的礼制乐器钟磬组合所占比重较大,而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钟磬组合则急剧减少,丝竹之乐和鼓吹之乐组合普遍增多。西汉时期以钟磬组合为代表的金石礼制乐器所占比重较大,诸侯王及列侯墓葬中均有各种材质的钟磬组合随葬。如洛庄汉墓出土的甬钟 5 件+钮钟 14 件以及编磬 107 件^⑭,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甬钟 5 件+钮钟 14 件+石磬 18 件及铜钩鐃 8 件^⑮,盱眙大云山汉墓随葬实用钟磬甬钟 5 件+钮钟 14 件+编磬 20 件以及明器钟磬 3 套^⑯,列侯墓如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陶编钟 5 件+陶钮钟 9 件+陶磬 20 件^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编钟 10 件+木编磬 10 件^⑱,等等。西汉时期无论是实用的青铜钟磬,抑或是陶、木制的模型钟磬,尽管其组合配置渐趋不完整,器物形制也趋于退化以至于模型化、明器化,但以钟磬组合为代表的金石礼制乐器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东汉时期钟磬组合类礼制乐器的数量急剧减少,迄今考古所见随葬实用或模型钟磬组合的仅有两例,即东汉早期的山东济宁肖王庄 M1(任城孝王刘尚),残存有灰陶钮钟 3 件^⑲,以及东汉晚期的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残存的石磬 1 件^⑳。在汉代乐舞画像或乐舞俑中已不见成编列使用的钟磬,如山东沂南北寨乐舞百戏画像中为 1 人执槌击编钟 2 件和 1 人击编磬 4 件^㉑,徐州汉画像艺术馆展示的铜山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墓,一图中 1 人执槌击磬 3 件、1 人执槌击钟 1 件^㉒,南阳草店东汉建鼓画像有钟 1 件^㉓,南阳七里园东汉建鼓画像有乐钟 1 件^㉔,南阳军帐营东汉建鼓画像有钟 1 件^㉕,等等,

考古所见东汉时期的钟磬多为单个或两三个使用,在乐队中处于不显著的编配地位,且多与建鼓相配合使用。

东汉时期,琴、瑟、笛、箫等为代表的丝竹弹拨类乐器组合明显增多,以各类鼓为代表的鼓吹乐的兴起尤为显著,而这些富于旋律和节奏感乐器的盛行反映了汉代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从汉代考古出土的乐器资料来看,金石之乐并未完全衰落,与丝竹新声有一个交融并存的发展过程。礼制金石乐器逐渐为最高统治者所使用,应用于汉代各种礼仪活动中。而音乐表现力更强的丝竹鼓吹乐,则取代金石重器的主要地位,广泛应用于汉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乐器组合由重向轻、乐队由大向小的转变,音色表现上是以富于旋律、节奏明快的丝竹等类乐器组合为主。

2. 汉代墓葬乐器的出土位置

汉代墓葬中乐器出土位置与墓主生前身份地位及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从目前考古材料看,汉代帝王、诸侯王或王朝重臣多采用外藏形式,即主墓外置大型的各类陪葬坑或椁室内的外藏椁,如洛庄汉墓周围有各种陪葬坑和祭祀坑近 30 个,其中 14 号陪葬坑为乐器坑,出土有钟、磬、鐃于、钲、铃、琴、瑟、笙、箏、建鼓等金石丝竹类乐器。^㉖临淄大武汉墓的 3 号陪葬坑出土有铜鐃于和铜钲^㉗。西汉中晚期的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墓出土 5 件青铜甬钟,分别位于不同的甲士俑军阵丛葬坑内。^㉘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主椁室外东、西回廊出土有实用钟、磬、琴、瑟及明器铜编钟。^㉙海昏侯墓在主椁室外的回廊型藏椁中,随葬有钟、磬、琴、瑟等实用乐器。^㉚洛庄汉墓墓主身份为吕王,临淄大武墓主为齐王,大云山墓主为江都王,均为王侯等级,而列侯及其以下等级乐器出土位置基本为内藏椁,即置于头厢、边厢或是椁室内。如马王堆 1 号墓随葬乐器分别在椁室的边厢内^㉛,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在头厢、北边厢置有陶制钟磬和漆瑟。^㉜

根据乐器出土位置、功能分区及同出器物的演变来看,西汉时期的王侯墓葬随葬乐器既有外藏又有内藏形式,东汉时期则以内藏为主。汉代无论是高等级王侯墓亦或是中小型墓,随葬乐器总体演变趋势是从墓室外转向墓室之内,呈现出由先秦浓重的礼制等级色彩到崇奢享乐的演变趋势,这与汉代“墓葬形制演变的总规律——宅第化的趋势”^㉝和

“随葬品变化的主旋律——生活化的趋势”的演变规律正相符合^③。

3. 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的地域特征

两汉时期墓葬出土乐器的类型、形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关。

首先是政治中心地区墓葬出土的乐器多为礼制乐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是西汉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地区上至帝陵、列侯及贵族墓,下到中小型官吏墓葬,均见有实用或模型乐器随葬。如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钟磬^④,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出土 10 件陶钮钟^⑤,薄太后陪葬墓出土彩绘陶甬钟 5 件、陶钮钟 9 件,^⑥阳陵陪葬墓出土的陶甬钟、钮钟。^⑦

汉代分封至各地的诸侯王墓葬,随葬乐器也多以礼制乐器为主,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虽被盗扰,但残存有铜钮钟 3 件和编磬 14 件^⑧,青州香山菑川王墓残存鎏金铜甬钟 4 件、鎏金铜钮钟 8 件,^⑨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残存有陶钮钟 9 件、陶编磬 12 件。^⑩

其次,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墓葬出土乐器带有明显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如扁体瘦长的“巴钟”,主要出土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即现今鄂西清江流域、川东湘西一带,以巴族人使用为主。与中原地区周制编钟形制明显不同的羊角钟,主要分布于云南和广西地区,湖南、贵州亦有零星发现,为古代百濮、越族活动区域。再如巴式罍于,顶部盘内钮多为虎钮,且多饰有船纹、鱼纹、鸟纹及椎形人面纹,均为典型的巴蜀符号和纹饰,主要集中在川东、鄂西、湘西和黔东北等交界地带,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⑪大致相当,为巴文化特有的代表器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地经济和文化联系密切,各民族文化日益融合,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的建鼓乐舞^⑫,云南、贵州出土的各种抚琴、鼓瑟、吹笛、击鼓等乐俑,^⑬与中原地区的风格基本一致,多是以琴、瑟、竽、笙为代表的“丝竹乐”和鼓、笛、箫、箏等为代表的“鼓吹乐”,汉统治疆域内各地的乐器文化呈现出了强烈统一性的特点,这与汉文化多元一体化的进程是趋于一致的。

4. 汉代金石钟磬的音列特征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尤其是洛庄汉墓、

大云山汉墓以及海昏侯墓出土的金石钟磬等礼制乐器,使得汉代无礼乐重器、钟磬乐衰落消亡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为我们重新审视汉代礼乐制度的历史原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所见汉代王侯墓中有洛庄汉墓、南越王墓、大云山汉墓、海昏侯墓编钟为实用乐器,钟磬乐悬配置完整,与先秦编钟瘦长清秀的形制明显不同。这四墓出土编钟钟体均矮胖浑圆,铣部外侈,于口弧曲较大,编列配置前三个都是 5 件甬钟+14 件钮钟的组合形式,海昏侯墓是 14 件钮钟和 10 件甬钟,多了一个 5 件组的甬钟,而出土的 4 件钟簠和 2 件磬簠则能证明这两堵编钟和另一堵铁编磬为完整编列,正可以构成《周礼》所载的轩悬。而编磬形制上很接近,均为倨背,弧底凸五边形,倨句角度较大,倨句有穿孔,鼓部稍窄长,股部稍宽短,鼓股大致接近《考工记》所载“股二鼓三”^⑭的比例。

研究人员对洛庄汉墓钟磬^⑮、南越王墓编钟^⑯以及大云山汉墓钟磬进行过测音^⑰,对海昏侯墓编钟进行了简单的测音^⑱。研究发现,这几组王侯墓编钟音列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均为由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声构成的正声音阶,甬钟音列起于“宫”,钮钟音列起于“宫”、止于“羽”,恰与《史记·乐书》所提倡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⑲的观点吻合。汉代墓葬出土的礼制乐器表现出其礼制规范突显,但其整体变化音不多、较为单一,音阶形式非常统一,旋宫转调的性能和音乐的丰富多样性明显逊色于先秦钟磬。从几座汉墓的年代来看,洛庄汉墓时代为公元前 186 年,大云山汉墓为公元前 127 年,南越王墓为公元前 122 年,海昏侯墓为公元前 59 年,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金石钟磬类的礼乐重器依然存在,尚未衰落消亡。与春秋战国时期金石之乐发展的繁荣鼎盛相比,汉代钟磬之乐在汉代礼乐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轻,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二、汉代礼乐制度的演变

从汉代出土墓葬中的乐器来看,汉代礼乐制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即由西汉时期的等级鲜明、彰显礼制演变为东汉时期的世俗享乐、强调乐为人用。

1. 西汉时期:等级森严、礼制鲜明

汉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制礼作乐,高祖“颇采古

礼与秦仪杂就之”^{⑤1}，制定出一套可供朝廷使用的礼仪规范，如《汉书·礼乐志》载“高张四县，乐充宫廷”^{⑤2}，说明汉代宫廷中的礼制钟磬乐器沿袭了周代礼乐制中“宫悬”的基本制式，《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皇帝随葬乐器有“钟十六，无虞。搏四，无虞。磬十六，无虞。塤一，箫四，笙一，篪一，祝一，敌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⑤3}。

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汉代乐器资料日益丰富，出土乐器的种类、数量、类型日渐增多，为揭示西汉时期礼乐制度的历史原貌提供了实物资料。西汉出土的乐器考古资料呈现出鲜明的等级性，尤其是在西汉高等级墓葬中表现尤为突出。

西汉诸侯王等级墓葬规模大，随葬乐器相当丰富。洛庄汉墓乐器坑，有木瑟7件、琴1件、悬鼓2套、建鼓1套、小鼓4件、竽和箛于各1件、钲1件、铃1件、铜串铃8件、编钟19件、编磬6套计107件以及乐舞俑22件，共计140多件乐器。^{⑤4}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乐器有编钟、编勾鑿、编磬、铎、钲、摇响器等共计138件乐器及相关音乐文物。^{⑤5}大云山汉墓出土箛于2件、铜钲2件、铜铃5件、实用编钟19件及神兽座2件、琉璃编磬20件、明器编钟3套约60件、陶编磬22件、琴轸4件、瑟柱19件等百余件乐器及相关构件。^{⑤6}西汉晚期至东汉，诸侯王墓礼制乐器骤减，仅见山东济宁肖王庄东汉任城孝王墓残存有做工粗糙的陶钮钟3件^{⑤7}。

汉代列侯等级墓葬随葬乐器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均大大减少，明显逊色于诸侯王墓。列侯墓随葬有实用的丝竹管弦类乐器如琴、瑟、竽、笙等，大型的青铜乐器如甬钟、钮钟等几乎不见随葬，礼制乐器钟磬均为陶质或木质的模型明器，基本不见鼓类乐器随葬，仅西南的贵县罗泊湾墓随葬有铜鼓及木鼓^{⑤8}。南方如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汝阴侯墓、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江苏泗水陈墩汉墓，^{⑤9}多有漆木乐器如瑟、琴、筑、竽、笙等丝竹类乐器随葬。

西汉时期，诸侯王国同制京师，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自置吏、得赋敛，因此诸侯王等级墓葬随葬有表示等级尊卑的礼制乐器。汉武帝时期，采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彰显天子独尊的威严，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绝对管理。表现在考古出土汉代乐器上，则是从西汉晚期至东汉，高等级王侯墓葬中以钟磬为代表的礼制乐器开始迅速

消亡，明贵贱、别等序的礼制钟磬亦逐渐成为最高统治者天子的专享与象征，强调君尊臣卑、皇权至高无上。从文献亦能印证，如汉光武帝刘秀，封鲁王兴为北海王，并特别赐给“虎贲、旄头、钟虞之乐”^{⑥0}，东海恭王刘彊为光武帝郭皇后所生，“帝以彊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虞之县，拟于乘舆”^{⑥1}。东汉时期，地位仅次于帝王的诸侯王，其所使用的钟磬礼制乐器、虎贲旄头等仍须由天子所赐才能拥有使用。

由上可知，汉初制礼作乐的渊源虽为宗周礼乐，然又不拘泥于儒家礼乐思想和古礼制规范，有因袭亦有革新。汉代礼制乐器鲜明的等级性及金石钟磬的兴衰消长，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背景，然究其演变，则与汉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强化的政治大一统趋势相一致。无论是王侯墓礼制乐器随葬多寡的演变及礼制钟磬的兴衰，抑或是起于宫、止于羽的音律关系，都更加突出了等级的森严，其尊君抑臣、君上臣下的礼制观念尤为彰显和突出。政治因素对汉代礼乐制度及音乐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2. 东汉时期：乐为人用、世俗享乐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指出上古圣王制礼举乐的目的，并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而是“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⑥2}两汉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发展，各阶层的思想意识和审美价值亦发生重大变化。与东周繁荣辉煌的钟磬雅乐相比，汉初以钟磬代表的传统礼制雅乐趋于僵化，虽能铿锵鼓舞，但不能晓其义，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这种呆板僵化的古乐是不符合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需求的，已不适合汉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审美。

汉武帝时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朝廷又任命善为新声的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⑥3}乐府的设置和职能的扩建，广泛地采集赵、代、秦、楚等地方的民间谣讴，民间俗乐大量进入国家的礼乐体系，并根据社会变革及音乐文化自身发展的多元需求加以改造创新，使得官方的雅乐与民间的俗乐相互交融，促进了汉代社会世俗音乐生活的繁荣发展，形成了汉代雅俗交融、相互并存的音乐文化面貌。同时汉代礼乐的功能亦悄然转变，乐不再局限于原始的祈神致福、

敬天祀地,摆脱了神秘庄严的等级限制,开始注重乐为人用,逐步走向日常社会、融入世俗生活,开始表现自身精神风貌、表达个人的情感追求等。

无论是考古所见汉代乐器资料,还是文献所载,均能看到东汉时期乐的日益生活化、从俗性的特点。汉墓所出土的大量的汉代乐舞百戏俑、乐舞画像,可以说是汉代社会世俗娱乐的代表性资料。汉代乐舞百戏俑或乐舞画像绝大多数都出土于汉代中小型墓葬,高等级墓葬如帝陵、诸侯王及列侯墓葬中很少出土。东汉时期乐器种类、组合及音乐形式与西汉有显著区别,乐器种类增多,尤以丝竹之乐和鼓吹之乐最为显著,而丝竹乐和鼓吹乐又是汉代俗乐发展的重要代表。^④

琴、瑟、笙、琵琶等丝类乐器,音色优美细腻、节奏明快,竽、笙、排箫、胡笳等竹类乐器,音质绵柔悠长、旋律连贯,丝竹之乐节奏优美富于音乐表现力,在汉代乐舞画像及乐舞俑中均有大量出土。河南、江苏、陕西、四川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乐舞俑,常见鼓瑟、抚琴俑与吹竽、排箫、笙、笛俑的组合,而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等地所见的汉代乐舞画像中,这种组合更是数量丰富,不胜枚举。如南阳王寨东汉乐舞画像石墓出土的乐舞画像中,乐人有吹箫、埙、长笛、鼓瑟等,有 1 人讴歌,^⑤江苏邳县白山东汉画像石墓所见的画像,为 1 人抚琴、1 人吹竽、1 人执节而歌,^⑥四川资阳县东汉墓出土的 6 件奏乐歌唱乐俑,其中击鼓俑 1 人,边击鼓边呈歌唱状,鼓瑟俑 1 人双手抚瑟,头高抬张口歌唱,另抚琴俑 2 人边弹边唱,^⑦这都是由击节者领唱,其他奏乐者和而歌之的相和歌的表现形式。

东汉时期乐的从俗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鼓吹乐的兴起与流行。据蔡邕在《礼乐志》中记载汉乐四品,一是大予乐,二是周颂雅乐,三是黄门鼓吹,四是短箫铙歌,^⑧其中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都是鼓吹乐,可见鼓吹乐在汉代礼乐中的重要地位。鼓吹乐兴起后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统治阶级用在朝会、出行、祭祀、宴饮等场合或仪式中以炫耀威风、宣扬功德等,如东汉在册封皇后时,“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⑨。同时又可将鼓吹乐作为一种赏赐,如汉顺帝时,乐浪王觐见天子,顺帝赐给其“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⑩。地方官吏、豪强富民也常常将鼓吹乐用于宴饮娱乐、日常出行、广场活动等,如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的说唱

击鼓俑、吹排箫、笙俑、抚琴俑,^⑪这些鼓吹乐俑神态活泼,特色尤为鲜明。

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之间的各种交流开始频繁,西域的乐器如胡笳、箜篌、羌笛、竖箜篌、曲项琵琶等渐入中国,使得鼓吹乐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出土于四川新都东汉墓的鼓吹画像砖,内容为一骆驼背上有 2 胡人击奏建鼓,2 胡人骑马吹竽、排箫,^⑫成都青杠坡 3 号东汉墓出土的鼓吹画像石,6 吏骑马所持乐器有鼓、笙、铙、排箫,^⑬正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汉代鼓吹乐的发展流行,无论是单独演奏还是组合演奏,亦或是配合乐队,既能融于旋律又可强化节奏,渲染气氛,具有更强烈的震撼效果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这种乐器组合及音乐特色,不仅确立了中国鼓吹乐的形式,也对后世的鼓吹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汉代乐舞画像、乐舞百戏俑中的器乐组合、乐队配置以及演出场所等内容,可以看出,丝竹乐和鼓吹乐之类的乐器种类可多可少,乐队的配置可大可小,可单独演奏,也可以在室内、广场、庭院等不同的场所演奏,其体量轻巧便于移动,深受汉代不同社会阶层的喜爱。如汉元帝不但擅长鼓琴瑟、雅吹洞箫,还能创作乐曲,“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声歌,分判节度,穷极幼眇”^⑭,东汉桓帝尤好俗乐,“善琴笙”^⑮,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马融,“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⑯。不但统治阶级喜好俗乐,王公贵族、豪强富民等亦无不以此为乐,《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了汉代社会富民奢侈享乐的行为,如富者“椎牛击鼓,戏倡舞像”,“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鼓瑟吹笙”,“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举办丧礼亦是“歌舞俳优,连笑伎戏”。^⑰

三、汉代乐器形制、功能转变原因探析

西汉时期,钟磬礼制的特点明显,到了东汉时期,乐器功能日趋生活化、从俗性特点显著,乐器功能由礼至俗的转换,有着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背景,具体分析如下。

1. 统治阶级身份构成的变化

汉初统治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如刘邦为楚地平民,任过秦的亭长,萧何在秦时只是个基层的刀笔小吏。周代的雅乐在汉代并不能吸引统治阶层的兴趣,如“今汉郊庙诗歌,为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

皆以郑声施于朝廷”^⑧。对于新兴统治者来说,周代呆板僵化的古乐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已不适合汉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审美。

见于汉代乐器考古资料,则是金石钟磬等礼乐重器的日趋减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重器的种类有甬钟+钮钟+编钟+编磬,数量组合亦是非常丰富,如曾侯乙墓编钟就有65件之多,分三层八组悬挂于曲尺形的钟架上,钮钟19件,甬钟45件,编钟1件,最大的钟重量达203.6千克,最小的钟有2.4千克。^⑨考古所见汉代钟磬,其组合均为甬钟+钮钟+编磬的配置,不见形制巨大、音响性能逊色的编钟。与先秦编钟形体瘦长、厚重高大、纹饰繁缛神秘相比,汉代编钟形体矮胖、轻盈小巧,不见通体遍布的装饰纹饰,整体重量轻且形体小,便于移动,能在不同的地点或场合演奏,而从音乐性能上看,钟体小则其延音就短,不见绵长悠远的回音,发音清脆悦耳,编钟的节奏感和旋律性增强,可以演奏节奏明快的乐曲,演奏古乐时使人昏昏欲睡的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2. 庄园经济的兴起

东汉统治集团核心基本都是地主兼商人的身份,形成了官僚、地主、富农为一体的豪强地主专政。^⑩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如刘秀舅樊重,其所自营的田庄,“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勤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渔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费至巨万”。^⑪庄园经济可谓是“集农、林、牧、副、渔业及手工业等为一体的经济模式,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组织”^⑫,田庄不但种植各种农作物,还有蔬菜、经济作物、各种植物等等,豢养牛、马、猪等牲畜,而手工业亦是包罗万象,庄园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均可在集市上出售,还设有大学、小学。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庄园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张,在汉代社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既能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需求、又追财求利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当时的音乐应该是世俗务实的,注重对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考古所见东汉时代的各种陶楼、院落、坞堡及各种陶俑如仓、灶、井、风车、猪圈等,以及墓葬画像,都是东汉庄园经济生活的反映。时代为东汉晚

期的河南灵宝张湾5号汉墓出土的三层庑殿陶楼,最底层为乐舞娱乐场景,1俑吹排箫,1俑吹竖笛,1俑吹埙,1俑抚琴,1俑作长袖舞。^⑬山东沂南北寨乐舞百戏画像石^⑭,表演内容有飞丸、都卢寻撞、七盘舞、建鼓舞等十余种艺术形式,乐队组合排列有序,所演奏乐器有钟、磬、瑟、笙、埙、排箫、鼓等,整个画像集歌、乐、舞、百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无不展示着世间生活的饱满热闹、现实生产、生活的乐趣。

3. 汉代各类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

武帝时期设立太学置博士弟子,东汉光武帝在洛阳修建博士舍及讲堂,吸引众多学士云集京师。除太学外,还设立了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鸿都门学,建立主要从事宫中幼儿教育 and 提高宫人知识水平的官邸学,还开设四姓小侯学。除了中央的太学、官邸学等,各郡国有郡国学,地方上则设有郡、县、乡、聚四个级别的普通教育机构,相对应为学、校、庠、序。同时汉代允许学者自办“私学”,收徒讲学,私学极为兴盛。与此同时,汉代民间的基础教育也非常普及,根据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记载,汉代乡村学校幼童入小学的情况,“正月之朔”,“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⑮即便是贫穷出身也有上学的权利,“贫子冬日乃得学书”^⑯。

汉代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健全,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⑰的局面,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有所改善。这为汉代音乐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机构保障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寻常百姓,学习音律、喜好音乐之风盛行。汉元帝擅于鼓琴瑟,吹洞箫,汉桓帝擅长弹琴吹笙,太学诸生则“雅吹击磬”,马融“善鼓琴,好吹笛”,^⑱蔡邕更是妙操音律、擅长鼓琴,《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⑲,此类记载不胜枚举。考古所见汉代乐舞画像、乐舞俑材料非常丰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由于汉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大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不同阶层的人民都可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

4. 丝绸之路的开辟

为抵御匈奴、消除对北方及都城长安的威胁,建元三年(前138)、元狩四年(前119)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打破了汉与西域诸国封闭的格局,“于是西域诸国始通于汉矣”^⑳。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东

①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②汪启明、赵静译注:《华阳国志译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3页。④杨帆:《汉代乐舞百戏俑相关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96页。⑤“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鼓博,去一以为鼓博。参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崙。”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第961页。⑥郑中国、方建军:《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钟、编磬测音报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⑦冯卓慧:《大云山汉墓编钟的测音分析与研究》,《中国音乐》2016年第1期。⑧王清雷、徐长青、曹薇蕤、李文欢、杨军:《试论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编列》,《音乐研究》2018年第5期。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84、1228、294页。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141、298、146、609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935、22、416、931、827、320、572、331、402、572、965、825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铜串铃8件形制相同,可算一件。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陆建方、杭涛:《江苏泗阳陈墩汉墓》,《文物》2007年第7期。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4页。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仁华、长山:《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尤振尧、陈永清、周甲胜:《江苏邳县白山故子两座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5期。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214、207、176、175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东观汉记》记载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短箫、铙歌,军乐也。”班固等:《东观汉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38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桓宽:《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14—215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剑鸣:《秦汉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1、283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河南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35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崔寔:《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3、102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七十三《杂曲歌辞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第368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6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17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in Han Dynasty Viewed from the Unearthed Musical Instruments of Han Dynasty

Chen Yan Qiao Ju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y,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of H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ritual music of Zhou Dynasty, but it also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of Han Dynasty was obviously mor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factors than by other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and regio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hierarchy of rites was more strict, showing the absolute monarchy and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imperial pow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rogress of social times and the opening up of the Silk Road,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di, Yue Fu expanded and changed its functions, the natural function of music in the Han Dynasty was more secular, focusing on people's enjoyment of music, which paid attention to music for people to enjoy, and opened up the prosperous and diversified music development mode with elegant and vulgar coexistence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musical instruments; Ritual and Music System